

## 《绝句》（两个黄鹂）的艺术得失

□ 福建省集美大学文学院 孙桂平

《绝句》（两个黄鹂）是名篇，小时候学这首诗，教师会要求记诵，而不进行艺术分析，结果不少人直至长大，还是一知半解。探究《绝句》（两个黄鹂）的艺术得失，对于读者深入理解该诗，当不无裨益。

### 一、善裁物象

大千世界，包罗万象，善于选择特定物象，使物象有机结合，正是写诗的基本功。在中国古代诗歌理论领域，这种功夫被称为“裁物象”。就写景诗而言，物象裁剪是否合宜，直接决定诗作艺术水平的高下。

学界公认，《绝句》（两个黄鹂）在写景艺术方面，达到了很高的水平。第一，诗人选择黄、白、翠、青等相互搭配，颜色丰富而和谐。第二，“两个”为点，“一行”为线，“窗含”“门泊”为面，诗人的目光随着点、线、面依次铺展，视线立体而灵动。第三，诗中“黄鹂鸣翠柳”是近景，“白鹭上青天”是远景；“千秋”写遥远的时间，“万里”写辽阔的空间。诗的前两句写动态，后两句写静态；全诗有声有色、远近交错、动静结合、时空呼应，意境新鲜优美。但这些只能说明，《绝句》（两个黄鹂）典型地体现了诗人裁剪物象的正常技巧，而不足以阐

发该诗在“裁物象”方面独具的匠心。

其实，“两个”与“一行”，极得剪裁之妙。杜甫草堂边的翠柳中应该不止有两个黄鹂在鸣叫，青天之下也不是只有一行白鹭在飞，但是诗人根据久别重返草堂的愉悦心境，只能如此着笔。曾经有人问我，将这两句改为“四个黄鹂鸣翠柳，两行白鹭上青天”，效果如何。显然，远不及原句。因为两个黄鹂在翠柳间相向而鸣，使人下意识地感觉这是一对黄鹂在窃窃私语诉说爱情，有清新生动之美。四个黄鹂相向而鸣，不免有吵闹之嫌而生嘈杂之感。至于用“一行”好而用“两行”差，是因为人的视线如果牵于“两行”，目光游移难定，“上青天”的动态在人的视野里就要失去爽直之美。刘禹锡《秋词》说“晴空一鹤排云上”，而不说“众鹤排云上”，大概出于同样的道理。

以窗取景，在杜甫之前已形成传统。陶渊明爱好“倚南窗以寄傲”，又说“夏月虚闲，高卧北窗之下，清风飒至，自谓羲皇上人”，就深得从窗看风景的悠闲与有趣。谢灵运则用诗句说“群木既罗户，众山亦对窗”，之后谢朓又写出“窗中列远岫”的佳句。杜甫发扬了这一传统，将雪山景象裁剪入窗而成诗。钱钟书说，春天应该镶嵌在窗子里看，好比画配了框。窗子打

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？

后来的历史证明，诸葛亮的这些话，是太乐观了，对自己的才能也太自信了。从史学角度来说，这是诸葛亮的不足。陈寿在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中，对他在大权在握、宏图大展之际的表现，作出这样的总结：

……立法施度，整理戎旅，工械技巧，物究

其极，科教严明，赏罚必信，无恶不惩，无善不显，至于吏不容奸，人怀自厉，道不拾遗，强不侵弱，风化肃然也。当此之时，亮之素志，进欲龙骧虎视，包括四海，退欲跨陵边疆，震荡宇内。他担忧自己不在之日，没有人能完成统一中原的大业，于是屡屡用兵，但是鲜有建树。这当然有许多原因，其中之一，是关羽破坏了他和

通了大自然与人的隔膜，让人安坐了享受外界美丽的景色。<sup>[1]</sup>“窗含西岭千秋雪”就符合这一鉴赏原理，完美地表现了以窗取景的艺术效果。

至于“门泊东吴万里船”，是别出心裁的取景境界。据梁代编成的《文选》，“门”在唐代以前的诗文中已经大量出现。当作者说关门，往往意味着拒绝与别人交往，或者意味着自己交往的请求被拒绝。而说开门，则表示欢迎别人，或者表示自己得到了欢迎。杜甫之前文学作品中的“门”，总与人情冷暖联系在一起，所以李适之不当宰相之后，就大发感慨：“为问门前客，今朝几个来？”《绝句》（两个黄鹂）过滤掉门的人事印痕，而独取佳景，让门有了窗的审美功能，这种写法确实别致。

## 二、用意良深

前人曾评论说，杜诗无一字无来处，浅读则不得要领。从字面看，《绝句》（两个黄鹂）是纯粹的写景诗，但若细究，则有很深的含义。这首诗写于唐代宗广德二年（公元764年）春夏之交。此前，广德元年十月吐蕃曾进犯长安，唐代宗出亡陕州，而十二月得以回銮。到广德二年春，朝廷局面逐渐稳定，其间故人严武重返蜀地担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，写信邀请杜甫到他的幕府任职。杜甫觉得有了依靠，就于广德二年暮春回到阔别两年的成都草堂。<sup>[2]</sup>知人论世，这首诗大致有如下深意。

“园柳变鸣禽”是南朝谢灵运的诗句，吟咏“新阳改故阴”之意，以表达诗人卧病复出之际对新春景象的惊奇感受。“两个黄鹂鸣翠柳”就是从这句化出的，结合朝廷局势转危为安的时

代背景，诗句既写出了杜甫久别之后重返草堂的新鲜感受，也寓含着诗人在朝廷历经艰难困苦复得安定局面之后，而备感欢欣的明朗心情。

“一行白鹭上青天”中的“上”字意为“奋举”，诗句化用了《诗经·周颂》中的“振鹭”意象。关于《振鹭》一诗的含义，东汉郑玄和唐初孔颖达作过解释，是说周朝廷仁义普施，德行广大，各个诸侯国都心悦诚服地来朝拜，操行纯洁的贤士也愿意来任职。<sup>[3]</sup>联系战乱频仍的政治形势，诗中的“青天”应喻指朝廷，寄寓了诗人对朝廷树立威信、重整纲常的期望。

第三句中的“雪山”即岷山，处于吐蕃与大唐王朝交界的地方，唐在此设有三座戍守边境的城池，如杜甫《野望》所说的：“西山白雪三城戍。”严武这次担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，主要任务就是用兵打击吐蕃，维持边境稳定。广德二年秋，严武带兵击败吐蕃军七万余人，吐蕃不敢再犯。严武死后，杜甫特地哀悼这一功绩说：“公来雪山重，公去雪山轻。”揆度上述前因后果，则“窗含西岭千秋雪”一句说的是“雪山重”，表明诗人赞同朝廷的边境政策，并对严武用兵的结果有着足够信心。

根据杜甫《狂夫》中的“万里桥西一草堂”，本诗第四句中的“万里”一词源自“万里桥”。在杜甫写作这首诗之前，万里桥有两个著名掌故。第一，诸葛亮为出使东吴的费祎送行时说“万里之行始于此”，桥因此得名。<sup>[4]</sup>第二，唐玄宗来蜀避难，回忆起僧一行的叮嘱，至万里桥止行，决定驻蹕成都。<sup>[5]</sup>诸葛亮联吴抗曹，寓有延续汉祚的大义；唐玄宗避难成都，是保存国统的标志；若联系动荡不安的局势，则“万

孙权结成统一战线的路线；其二就是，他自己才能毕竟有限。陈寿说他“治戎为长，奇谋为短，理民之干，优于将略”，说白了，他是个行政干才，不大会打仗。《三国演义》写他六出祁山，九伐中原，劳师动众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；杜甫说他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。

诸葛亮说只要派一上将和刘备一起出征，

就能轻易取得胜利，是自信得有点天真了。从文学上来说，这是很生动的一笔，正表现了这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，多多少少有点浪漫，有点天真的空想。可是从史学来看，毕竟为后来的实践所证伪。这种不切实际的空谈，司马光是不可能赞赏的，所以把它删节了。

（全文完）

里”一词当含有诗人的政治见解：成都安宁，则天下太平指日可待。

可见，《绝句》（两个黄鹂）也是言志之作，隐含着诗人对时事的深切关注，并透露出诗人对于王朝中兴可期的喜悦之情。

### 三、美中不足

长期以来，《绝句》（两个黄鹂）因为有写景如画之妙，多次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。实际上，这首诗在古代就已经备受关注，不过诗评家所讨论的，更多的是其缺点，而不是优点，并形成了基本一致的看法：《绝句》（两个黄鹂）算是好诗，但并非好的七绝。这里按照七绝诗的创作要求，分析一下这首诗在艺术上的不足。

七绝在唐代是一种成熟的诗歌形式。其诗体特点的形成，与两大传统有关。第一，绝句得名于联句，联句是从汉代开始流行的应酬交际方式，既然是聚会助兴，作者为得到现场认同，就会创作切近人情的诗句以获得共鸣效应。七绝是联句的后裔，自然带有联句通达人情的遗风。第二，七绝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，逐渐与流行音乐发生联系，并最终成为流行乐曲的歌词，形成通俗晓畅的美学风貌。根据现存名篇分析，盛唐诗人对于七绝的创作原则，已经认识得很清楚：从内容方面说，表情达意不能尖刻生新，当关注人类普遍的情感；在表现技巧上，不宜对事、物或情感作工笔描绘，当虚实相间，或以比兴手法写意传神；在语言形态上，不宜晦涩艰深，当求明快畅达。《绝句》（两个黄鹂）基本上不符合这些创作原则。

从内容上看，《绝句》（两个黄鹂）是纯粹写景的，没有关注人类普遍的情感，甚至连诗人自己的情感也表露得很隐约。魏、晋、南朝时期的诗歌实践已经证明，五言长诗适合于写景，七言绝句则拙于写景而长于写情。杜甫违反惯例，将一首七绝写得如此不近人情，不合七绝诗的体例。

从表现技巧上看，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”是工笔描绘，没有比兴的功用，

这种五言诗中惯见的写法，在七绝中就显得笨重。而且，这首诗的虚实关系也没有处理好。诗中“千秋”“万里”是虚写，其他都是实写。但这两处虚写，纵然能使第三、第四句显得生动，却与第一、第二句没有关系。这样，本诗前两句就过于落实，成为典型的“拙句”。

从语言形态上看，这首诗虽然不晦涩艰深，却犯了“拘于对偶”的毛病。沈祖棻在《唐人七绝诗浅释》中说：“用偶句写绝句诗，一般说来，由于十分齐整，容易失之板滞。”<sup>〔6〕</sup>这首诗前后两联都用对偶，每联之内诗意虽然能够相互照应，但两联之间没有过渡，缺乏相成或相反的意义联系。宋人洪迈认为此诗属于“绝句诗不贯穿”的情形，<sup>〔7〕</sup>可谓一语中的。

那么，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问题呢？明代胡应麟说，“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”一联，本来是“七律壮语”，但杜甫却不恰当地处理成绝句。<sup>〔8〕</sup>对于如何理解《绝句》（两个黄鹂）艺术上的不足，这一评论很有启发意义。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，这首诗没有明确的标题。这也许说明，杜甫本来是想写一首七律的，先成“两个黄鹂鸣翠柳”等四句，但未能得到其余两联，后来就径录这四句独自成诗。如果这四句诗原是七律中精彩的两联，那么其没有成为七绝中的佳作，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〔1〕钱钟书《写在人生边上·窗》，辽宁人民出版社、辽海出版社 2000 年版。

〔2〕陈贻焮《杜甫评传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。

〔3〕清·阮元《十三经注疏》，中华书局 1980 年版。

〔4〕南宋·范成大《吴船录》（卷上）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。

〔5〕清·顾祖禹《读史方輿纪要》（卷七），中华书局 1955 年版。

〔6〕沈祖棻《唐人七绝诗浅释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。

〔7〕南宋·洪迈《容斋五笔》（卷十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。

〔8〕明·胡应麟《诗薮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。